

中共与 国民党地方实力派 关系史

唐纯良主编

人民出版社

中共与
国民党地方实力派
关系史

主 编唐纯良

副主编徐首军

唐显贵

李代玲

张军民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包靖国

装帧设计：王师颀

版式设计：程凤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共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关系史/唐纯良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

ISBN 7-01-002085-X

I.中…

II.唐…

III.国共合作-关系-地方史

IV.K265.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94) 第12092号

中共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关系史

ZHONG-GONG YU GUOMINDANG DIFANG SHILIPAL GUANXI SHI

唐纯良 主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通县曙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年2月第1版 1995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9.5

字数462千 印数：1—3000册

ISBN 7-01-002085-X/K·455 定价：19.00元

绪 论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关系史，是中国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争取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发动全民族力量，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斗争的重要一环，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这项工作的卓有成效，是中华民族解放和复兴的基本条件之一。因此，研究和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应为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是中国近代历史特殊条件下衍化出来的情况复杂、派系众多的军事政治集团。他们包括几十个曾经显赫一时的重要人物。按照所在地域和隶属关系至少可以划分为十大派系，计有（1）滇系、（2）桂系、（3）粤系、（4）湘系、（5）川系、（6）冯（玉祥）系、（7）奉张系、（8）晋阎系、（9）新盛系、（10）绥傅系等。他们渊远流长，情况各异，各具特色。但是，自从3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日本侵华的扩大，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就形成了中共同他们建立和发展统战关系的基础。

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他们都有地方军阀的历史渊源。

从历史来源看，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

北洋军阀时期的地方军阀，例如奉张系、晋阎系、冯系、川系等。他们有的是在北伐战争时期倒戈脱离北洋军阀关系，参加了国民革命；有的是被叛变革命后的蒋介石国民党所收编，在南京政权建立后，成为国民党地方军阀。他们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追随蒋介石进行了反共战争，但又同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军阀存在尖锐的矛盾。他们为了抵御蒋介石消灭异己政策求得生存，单独或者联合，反复、长期地同中央军阀进行混战。经过反复斗争，他们都败于蒋介石手下。有的经过顽强争夺勉强保住了地盘（如晋阎系和川系），他们虽然服从国民党中央的领导，但随时都有被中央吞并的威胁，因而经常处于戒备状态。有的则在不同情况下基本上失去了地盘（如冯玉祥）。他们的军队有的被收买，有的被改编后加以肢解，或调遣他处成为无地盘的杂牌军。有的虽失去了地盘，但仍保持了对自己军队的指挥权（如奉张系）。这种类型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经历了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地方军阀的演变过程，有两段军阀史。

另一种类型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是在国民革命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粤系的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新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滇系的龙云、卢汉等都是这一类型的势力。他们在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有推翻当地旧军阀和北伐战争的战功，后来又追随蒋介石叛变革命和进行反共战争。但他们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为抵御蒋的消灭异己政策而自成体系。他们同国民党内中央反对派（如汪精卫、孙科、陈公博、胡汉民等）保持密切联系，多次进行反蒋战争，基本保住了地盘。这种类型地方实力派的历史特点，是他们经历了从国民革命军到国民党地方军阀的演变过程，有一段军阀史。

从国民党地方军阀演变成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关键因素，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特别是在本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帝国主

义侵入华北。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独占殖民地，改变了中国的阶级关系，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抗日，扩大了国民党营垒的分裂。另一重要历史因素是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在30年代初期告一段落，原国民党各地方军阀在反蒋战争中败北，军权和地盘都遭到很大削弱。他们受到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强烈要求抗日。他们又受到国民党中央的强大压力和威胁，不得不千方百计地谋求生存。他们从蒋介石“围剿”失败中看到共产党的强大力量，又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看到了中华民族自救的方向，因而要求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一致对外。他们政治立场的这种巨大转变，酿成了30年代前期和中期一系列重大事变：“九·一八”事变不久就发生了马占山江桥抗战和蔡廷锴十九路军上海抗战；1933年5月发生了冯玉祥联合共产党组织察北民众抗日同盟军进行的抗日战争；同年10月又发生了蔡廷锴、陈铭枢等反蒋的福建事变，同红军签订了抗日反蒋初步协定；1936年6月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两广地方实力派发动了“北上抗日”的反蒋事变；同年秋发生了傅作义领导的绥远抗战；同时期发生了在西北“剿共”前线的张学良、杨虎城同红军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并在12月12日发动了震动中外，成为中国历史上一大转折的西安事变。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些事变，导致了十年内战的停止和全国抗日的新局面的形成。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

二

从上述历史演变过程看出，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同旧日军阀有了显著的区别。中国近代史上的军阀，除了“拥兵自重，割据一

方,自成体系”^①的基本特点之外,还都具有很强的封建性和买办性。所谓封建性,就是他们的代表人物多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出身,政治上反对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代表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所谓买办性,就是他们对外勾结帝国主义以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或帝国主义集团)为靠山,确立和发展自己的势力,出卖国家民族,充当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代理人。无论北洋军阀时期还是国民党南京政府时期,中央军阀和地方军阀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基本特征。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则在这方面有了显著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爱国性的增强。他们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就对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政策“目睹身受”,认识到“非作殊死斗争不可”,因而强烈要求抗日,表示要“恢复失地,效死疆场”。主张“必须发动整个民族解放战争,本宁愿全国化为焦土也不屈服之决心,用大刀阔斧来答复侵略者”^②。有的率部脱离经营有年的地盘,奔赴抗日前线杀敌,为民族解放作出重大牺牲和贡献。

二是民主性的增强。国民党地方军阀一向以“反对独裁”作为反蒋的斗争口号。他们指责蒋介石使“党成一人之党,中央成一人之中央。假中央集权之名,行专制独裁之实”^③。30年代中期以后,他们在“拥护蒋委员长领导”的同时,仍然向蒋介石要民主,反对蒋介石独裁和国民党一党专政,从而起到有利于抗日斗争的积极作用。

三是进步性增强。其主要表现是拥护中共的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和抗战到底的基本政策,认为应当“容纳共产党,如总理北伐时然”,“停止内战,团结做抗日工作,以免把有为之优秀青年自相

①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932页。

② 李宗仁:《焦土抗战》,《焦土抗战的理论与实践》(1938年桂林出版)。

③ 宋哲元等27名西北军将领拥阎冯讨蒋通电,《国闻周报》卷6第27期。

牺牲^①”。他们不顾蒋介石的禁令，主动采取联合共产党的行动，有力地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明显地减少了封建性、买办性，增强了爱国性、民主性、进步性，不同于昔日地方军阀了。

毛泽东指出：地方实力派的领导成分也多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周恩来也说过，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也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但是他们也都说过，在革命历史上，政治人物的阶级倾向是能够变化的，各阶级的代表人物，更不是固定不变的。毛泽东曾精辟分析过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这种变化：“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分裂的。这种分裂，表现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表现于冯玉祥、蔡廷锴、马占山等风头一时的抗日人物。”^②又说“蔡廷锴等人领导的第十九路军是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呢？他们是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③总的说，在爱国性、民主性、进步性增强这个问题上，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表现出民族资产阶级倾向。

我们不能把复杂的事物简单化，把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看成一模一样、一成不变的势力。实际上，他们是国民党营垒中情况各异而又不稳定的势力，他们身上的封建性、买办性还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即使最进步人士也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某种联系；而另外一些人则比较接近蒋介石集团，封建性、买办性更多，甚至在全民族抗战中还同日本帝国主义有勾结（如阎锡山）。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爱国性、民主性和进步性有更大的差异，而且在不同

① 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第387页。

②③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2版（本书所引此书文句均为此版，下同）第一卷第147、145页。

时期有巨大的升降幅度。他们中一些人抗日时期参加过反共磨擦，解放战争时期又参加了向解放区的军事进攻；有的转向人民方面；有的则同人民对抗到底，追随蒋介石逃往台湾。就是说，我们在分析他们同国民党顽固派，同旧军阀的不同特点时，又不可把他们说成再无反动和落后的一面。他们毕竟是国民党营垒中的势力。

三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正确的认识 and 政策的形成，也有一个发生、发展和深化的过程。

早在国民革命时期，投入国民党营垒的地方实力派都同中共有过合作关系，有的甚至是经过中共的推动才转向革命方面来的，如冯玉祥就主要是在中共和苏联帮助下参加北伐战争的。1927年夏，这些地方实力派基本上都追随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而去。当中共打起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旗帜，进行武装斗争的时候，他们又参加了“剿共”战争，同时他们互相间又长时间进行军阀混战。此时的中共把他们看作反动军阀，是理所当然的。当时毛泽东说：“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①这个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这时“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小资产阶级急性病”反映到中共党内

^①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47页。

来，从而产生了“左”倾情绪和政策。

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①。这种错误又进一步发展成“中间势力危险论”，认为各种改良主义是最危险的敌人，必须“加紧、坚决”地对它们进行斗争。“九·一八”事变以后，在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下的党中央，对由形势变化而产生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抗日反蒋行动，错误地采取关门主义政策，认为他们是“欺骗民众的老手”，是“更危险的敌人”。王明领导的中央虽曾发表过号召抗日统一战线的宣言和文告，但由于“左”倾路线的指导而不能发生实际效果。正如毛泽东形容的那样“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中共地方组织曾经发动群众支援他们的抗日行动，但是，党中央一再纠正他们“上层勾结”的“右倾错误”，强调要在联合抗日的同时揭露上层军官的反革命实质，拒绝同福建事变的十九路军真诚合作，并企图组织冯玉祥领导的察北民众抗日同盟军暴动，使他们变成红军等等，就是这种“左”倾关门主义的典型事例。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正确路线以后，创造了正确对待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基本条件。同年底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解决长征路上无法解决的中央政治路线问题。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批评和纠正了王明路线的“左”倾关门主义，正确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抗日及国民党营垒分裂的形势，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这次会议奠定了争取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

① 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58页。

的思想基础。此后半年之内，采取有效措施在北方同“剿共”前线的张学良、杨虎城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同时也同山西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建立了统战关系。

1936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这一指示放弃了“抗日反蒋”的口号，确立了包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南京政府在内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同时也指出：

“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的联合。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的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就愈能实行这一方针。对广西方面，我们赞成他们抗日发动”。“宁粤两方冲突时，我们应力求避免在全中国人民面前袒护一方面的态度。”^①这标志着中共改变了单纯利用矛盾的政策，把对南京以外各派各军的态度纳入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正确位置中去。

9月，广西方面的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派代表钱寿康，带着《抗日救国协定》草案来陕北商讨抗日合作问题。中共中央非常认真地同钱寿康讨论了有关问题，然后依据“停止内战，互相合作，唤起民众，对日施行武装抗战，驱除日本帝国主义”等基本原则，对他们的草案作适当修改形成正式文件，予以签署。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写信给李、李、白三人，称赞他们的草案“谋国伟画”，表示“无任钦迟”，并声明“生效时间，以诸位先生签署之日为准”。这个历史性的文件，中共第一次对国民党地方军阀使用了“实力派各系”的提法。^②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以同广西方面所订《抗日救国协定》为蓝本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⑩（本书所引此选集文句均为中共中央党校1985年版，下同）第85页。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本书引用此书文句均为此版，下同）第70～71页。

形成了《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作为中共同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谈判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基础，也由钱寿康捎给粤系蒋光鼐、蔡廷锴等，并派彭雨峰（即彭雪枫）赴兰州、归绥、太原等地，分别会见于学忠、傅作义、阎锡山等北方各地方实力派，谈判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从此，中共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工作，有了具体纲领，改变了个别争取状态，开始全面系统的工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民族抗战的发动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顽固势力，走上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道路，制造了两党的许多摩擦，甚至发展成反共高潮。各地方实力派，有的也追随蒋介石参加反共行动。中共党内有人认为两次反共高潮是马日事变和“四·一二”的重演，整个国民党都要走到反共反人民战争方面去。毛泽东及时分析了客观形势，指出中日矛盾仍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仍然是个两面性的阶级，它并不想同人民最后破裂。我们一方面用“以打对打，以拉对拉”的革命两面政策对付它们，一方面又要坚持“将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顽固派和没有或较少有买办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

在这个总方针中，明确地把地方实力派划入争取对象范围内，把他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同等看待，即使参加了某次反共的地方实力派，也把他们同顽固势力区别开来。事实上，参加了第一次反共高潮的阎锡山，在更严重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时又保持了中立的态度；参加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桂系势力，仍同蒋系有矛盾，同蒋介石反共态度仍有区别。证明了中共对待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方针的正确性。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共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统战关系的全盛时期。其主要表现：（一）中共同各地方实力派都建立了合

作关系，并且同其中大多数保持和发展了较好的关系。阎锡山、桂系势力曾参加过个别的反共行动，但经过中共又联合又斗争策略的正确运用，使他们仍在不同程度上保持了同中共互相合作的关系；冯系、川系、滇系、粤系同中共一直保持了较好的合作关系；只有新疆的投机分子盛世才，在苏德战场上法西斯最得势的时刻，受顽固派的策动，同中共决裂并走上了疯狂反共的道路。

（二）中共同各地方实力派进行了全面有效的合作。八路军在太原、长沙、桂林、昆明、迪化、兰州等地建立了办事处。一些实力派将领请共产党人向他们培训军事干部，创办抗日团体，发动群众。有的同解放区相邻，请解放区支援粮食、兵员。各地方实力派对人民军队也有些武器和物资的援助。他们的军队同八路军、新四军互相配合，共同进行战役作战，例如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太原战役、台儿庄战役，配合作战都起了很大作用。在政治上各地方实力派几乎都同中共中央订过书面的或口头的抗日救国协议，建立了联系渠道。中共中央南方局为联合西南各省实力派做了许多工作。有的西南地方实力派还设置了与延安的秘密电台，实行“联共抗蒋”或“借共抗蒋”。他们时常约见中共领导人或代表，征求和听取对重大政治问题的建议。有的还请了共产党人担任顾问、秘书等职，为他们出谋划策。他们同共产党密切配合，进行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斗争，共同支持当地的民主运动。刘文辉、龙云等人还经过共产党人的介绍和联络，秘密加入了民盟组织。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时，一些民主党派和共产党人在重庆面临政治迫害的极大危险，大批转移到昆明、桂林等地，在卢汉、李济深等人帮助下，从事民主运动。在文化思想上，中共同各地方实力派也有许多合作。抗战开始，广西当局成立了广西建设会，聘请大批进步学者教授，其中包括一些知名的共产党人，到广西参加经济文化建设，在那里创办一批报刊，

对于宣传民族、民主思想，使桂林成为当时大后方著名的“文化城”。第二次反共高潮之后，进步文化人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迫害，大批转移到滇系管辖的昆明，使这里成为抗战后期以至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民主文化运动的重要基地。其他地区，如安徽、四川、河南等地也有这种文化合作。

四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关系，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其重要地位和作用，积累了丰富的统战工作经验。

中共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关系史，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特殊的历史作用。

第一个阶段从1935年到1937年，是这一统战关系的开创时期。这一阶段，中共在武装反抗国民党军事“围剿”胜利的基础上，正确把握中日民族矛盾尖锐化和民族危机的客观形势，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为口号，首先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在抗日救国问题上取得了共识，开始了实际合作，有效地击破了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开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民族抗战的局面。因发动西安事变而起到关键作用的张学良被人民誉为“民族英雄”和“千古功臣”。

第二个阶段从1937年到1945年，是这一统战关系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中共进入成熟时期，已经形成完整的正确的新民主主义总路线，并把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纳入策略总方针的轨道上来。通过放手发展人民实力，对顽固派有理、有利、有节的反击，争取了地方实力派的较好统战关系，从而维持了全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到民族解放战争的完全胜利。

第三个阶段从1945年到1949年，是这一统一战线新发展和大

收获时期。这一时期是国共两党新的分裂和全面内战时期。在全面内战的历史条件下，中共领导解放区军民，在对蒋介石自卫战争胜利发展的同时，仍然坚持区别对待的政策。中共中央在一个“政策指示”中指出：“对民主同盟的恢复活动，对李济深等国民党反对派，对在美的冯玉祥，对一切可以争取的中间派，不管他们言论行动中包含多少动摇性及错误成分，我们应采积极争取与合作态度，对他们的错误缺点，采取口头的善意的批评态度。”^①这就保持和发展了历史上的统战关系，争取到地方实力派的许多领导人脱离国民党营垒，转到人民方面来。主要是由他们领导的近百万国民党军队的起义和投诚，走上光明道路，加快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

三个历史阶段的发展，充分说明了中共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统战关系的巨大历史作用，证明了中共统一战线方针和地方实力派联共政策的正确性。总结这些历史经验，很有现实意义。

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第一，中共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关系，实质上是对国民党内民主派的统战关系，对他们能够争取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从30年代中期到第三次国内战争全面爆发，前后十多年内，中国共产党以整个国民党为统战工作的对象，但是国民党的实际情况，决定了整体统战关系中夹带着特殊局部统战关系。

蒋介石统治地位确立以后，国民党内派系林立。国民党中央的反蒋派系，政治影响较大，但无实力，不能构成对中央军阀蒋介石最严重的威胁；而地方实力派中较为强大的，如桂系、粤系、冯系、阎系的反蒋，很早就企图问鼎国民党中央权力，取代

① 《中共中央文件文集》④第5页。

蒋介石，他们联合国民党中央反对派，也同外国势力有联系，多次举行大规模的反蒋战争；势力较小的地方实力派的反蒋基本上是自卫，是为了抵御蒋介石剥夺其地盘，消灭其军力。这种矛盾斗争，贯穿在蒋介石二十二年统治时期，从未间断，构成了对蒋介石统治的直接威胁。但是这种斗争的性质和形式，30年代中期前后发生了显著变化。日本侵入中国以后，改变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也改变了国民党内关系。国民党地方军阀，在全民族抗战的总形势下，放弃了武装反蒋的斗争，但同蒋介石仍然存在着尖锐的利害冲突。他们仍然拥有地盘和军力，成为有实力的反对派，故称地方实力派。他们出于抗日和与蒋抗衡的需要，具有联合共产党的要求和行动。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共把自己统战范围加以扩大，另辟新领域，确立了与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关系。

国民党是近代中国最大的资产阶级政党。其内部包括了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最主要的成分。两个主要成分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曾经居于主导地位。孙中山时期（1927年前）民族资产阶级在国民党内居于主导地位。以后蒋介石代表大资产阶级统治国民党几十年。这期间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实际上是国民党内的反对派。30年代中期以后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尽管他们间有很大差异，政治态度和实际表现也很不一致，但是客观地位和作用，基本上是属于国民党内反对派范围内的。中共把地方实力派视同民族资产阶级，列为争取对象的中间势力范围内，并且有一整套不同于对待国民党当权派的统战政策和态度，其客观依据就是如此。

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把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包括在内。但是一般来说，大资产阶级不可能接受无产阶级领导，而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却是能够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只要“（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

(3) 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①这个领导权是能够争取到的。

第二，中共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关系，也是又联合又斗争的关系，但是这种联合和斗争都不同于对待顽固派。

统战对象的两面性，决定了又联合又斗争的统战策略。但是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两面性同国民党顽固派的两面性是不相同的。因此，同他们的联合与斗争都不同于对待顽固派。这里有两个明显的区别：（一）联合的目的和范围不一样。抗日战争时期联合国民党顽固派的目的是共同抗日，共同抗日一结束，这种联合即行结束。而对地方实力派的联合，除了联合抗日以外，还可以联合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在一定范围内共同进行民主运动，争取他们在反顽固派军事斗争中保持中立；抗日战争结束后对地方实力派的联合并未结束，而是进入争取他们中的多数脱离反动营垒的新阶段。总之，中共同地方实力派的联合与合作是比较好的，并且是不断发展的联合与合作。（二）斗争的方法与手段也有很大区别。“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斗争在统一战线中是很重要的。但斗争与团结是手段和目的关系，手段服务于目的。这些基本原则，不论对什么样的统战对象都是适用的。由于对顽固派的斗争目标是使之陷于孤立，而对地方实力派统战目标是为达到争取，因而手段的运用大不一样。军事上在抗日战争时期对地方实力派也曾有过冲突，这主要是由于地方实力派参加了顽固派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如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对阎锡山旧军的反击，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在皖东对李宗仁桂系的反击等。这些局部的军事反击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同对顽固派的反击比，

① 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747页。